

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 在晚清中国的传播

黄兴涛

在日本近代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除了中国驻日外交官、考察者和游历人员自身之外,日本人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一面向华人的传播过程呢?如果有,这一过程开始于何时?他们都做过什么,对于他们的传播业绩、意义又该如何估计?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最近,又读到一些相关的资料,故在此特以札记的形式将该问题明确提出,并略作分析,以供同道学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

我最早接触到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大约10年前。那时,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早期来华活动且影响较大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9世纪40年代所编的两部英汉汉英词典,却发现他1839年已编辑出版过另一本《英和和英辞典》,并从中得知他对日本汉字词已经相当了解。在该辞典里,麦都思译“Empire”为“帝国”,这使我开始怀疑有的日本汉字译词进入

中国,可能远比今人所想像的要早。该辞典虽然出版于巴达维亚,但在当时来华传教士中肯定有所传播。传教士中有的既懂中文,也懂日文,他们可能使中日间词汇互动的问题变得复杂了。但我当时是认定“帝国”一词为日本人创造,而麦都思不过是承用而已的。因为麦都思在稍后出版的英汉和汉英词典中,都不曾把“Empire”译成“帝国”。1901~1902年间,严复译“Empire”时,也用的是音译词“英拜儿”,并注释说“近人译帝国”,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但刘禾在她的《跨语际实践》一书中却强调“帝国”与“Empire”等同起来,究竟是最初见于教会汉语的译法,还是经日语而进入汉语,目前还“不甚了了”。(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版)这提醒我们注意: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于“帝国”一词究竟如何使用还有待考证。

这两年,我集中看过明清之际的几乎所有重要而易见的传教士汉译西书,做过较为详细的笔记,都没有从

中发现“帝国”一词的现代用法。据刘禾和汪晖研究，在古汉语里，“帝国”一词或指京城，或指皇帝统治下的国土范围，或指五帝统治下的那种理想化的德治之国。（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版；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4年版）这种传统用法在中国本来就不太流行，清末以后由于受到日本用法的影响，就更加不显了。但无论该词的现代意义是为日本人所发明，还是由在华西方传教士所创造，他们两者之间对于近代汉字新名词形成的互动关系，都应该引起今人重视。

毋庸讳言，在创译现代汉字新词并向中国人传播方面，晚清西方传教士与日本早期特别是明治初期的洋学家之间存在的那种互动关系，目前学术界还研究得很不够。我2005年1月在日本神户大学和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报告《现代中国“文化”观念的兴起》一文时，曾提到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83年出版的《西学考略》中多次于现代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问题，日本学者森纪子教授等就立刻提醒我，他可能受到日本洋学家中村正直的影响。因为他的用法很突兀、很现代，而在此前后，丁韪良与中村正直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仅其汉文西书被中村正直译成日文出版，他写作《西学考略》时还曾途经日本，对日本进行考察，期间专门拜访过中村正直。另一个在中国传播西学贡献不菲的传教士韦廉

臣，也与中村正直等日本人交往频繁，彼此经常有交换书籍的事情发生。对此《万国公报》也曾经有所报道。

其实，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像中村正直这样精通汉学的洋学家，就曾在传教士于中国境内所编辑出版的有关中文报纸上刊登过不少中文作品，只是一般人不太留意罢了。如《万国公报》1878~1880年间，便刊载过中村正直汉译的所谓“西国名士诗”《僻村牧师歌》署名中村敬宇，这无疑算得上汉译西诗的早期作品。另有一个名叫中田敬义的日本学者，也于1880年2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发表过《伊索寓言》的片段，题为《伊萨普喻言》。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里，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与传教士有着密切交往的那些日本人，他们通过这种交往，可能较早地就在向中国人传播日本汉字新词方面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19世纪70~80年代，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最近一些年，大家都比较注意来华传教士所编早期英汉字典对日本明治汉字新词的影响问题，这当然极有意义，但在日本汉字新词传到中国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是否也起到某种值得一提的作用呢？在此，我愿意把这一问题郑重提出，盼望学界同人能够对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扎实的研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二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最近细读

《万国公报》时产生的 就是日本人近代创办的一些早期报刊 ,尤其是中文报刊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曾传到中国 ,实际上它们已经在中国传播了一些日本汉字新名词。对此 我孤陋寡闻 ,似乎还未见有学者明确提及和专门研究过 ,但自认为 ,这或许是不该被忽视的现象。

据我所知 ,至少从 1875 年起 ,像《万国公报》这类报纸就开始明确地从日文报纸来摘译各种消息了。比如 1875 年 6 月 19 日 ,该报第 341 卷的“大日本国事”栏就有报道题为《陆军中将赴美国百年会》。报道中的复合词“陆军中将”,显然就来自日本报刊 ,并且很有可能这还是该词首次进入汉语。1876 年 12 月 16 日 ,该报所刊《论待外人宜从本国律》一文 ,已经明确注明是出自日本的《日日新闻》了。

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 ,同年 9 月 23 日 ,《万国公报》“大日本国事”栏还专门报道了日本东京《新设华字日报》的消息。1876 年和 1877 年 ,该栏的许多期里有关日本的报道 ,多直接注明系“录照抄东京……华字新报”——一份东京出版不久的中文报纸。如 1877 年 3 月 24 日 ,《万国公报》第 431 卷里的该栏目一共有 6 条新闻 ,5 条均注明是来自日本“华字第八号新报”。其中有一篇报道题为《论工业制造之利》。这里出现的“工业”一词 ,大约也是以现代意义在中国的较早使用 ,如果不是最早使用的话。(此前到过日本并对日本有所介

绍的只有罗森和何如璋等寥寥几人 ,似不曾见其传播过上述词汇)

我没有见过日本东京创办的这本“华字新报”,它的确切名字是什么,我也不晓得。委托几个日本朋友帮助查找,也没有结果。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些华文报纸数量和影响如何,日本学界或许有过研究,但从日本汉字新名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这一角度来进行探讨,似乎还很少见有人自觉尝试。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晚清时期,日本人用汉文写作的书籍有的曾经传到中国,直接传播了一些日本汉字新名词的问题。这一点目前也没有得到中日学者真正的重视。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不少知识分子是可以直接用汉字来书写和创作的。我曾经读过日本文人冈千仞(鹿门)用汉文写的几本书,比如他记录游览中国、拜访名人经过和感想的《观光纪游》,1884 年出版后,就曾广赠中国朋友,不少中国士大夫都曾因此得以阅读,而该书就曾在现代意义上几次使用了“宗教”等词。如“今观欧俗,修德性以上,属宗教;上自王侯,下至士庶,誓救主守十诫,此异我孔孟……”(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2 辑)

另外,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人比较熟悉的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一书,也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的中国传播过“宗教”、“市场”、“民族”等现代意义的新词汇。在日本,《万国史记》出版于 1879 年,很快即

传到中国。该书在中国有许多版本流传,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传播极广。大约是在1884年,著名的申报馆也在中国正式翻印过此书,这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该书版本。另外,1884年前后,申报馆还曾出版过节录此书内容的小册子《万国总说》。像《万国史记》这样的日人所写的汉文著作,在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方面的贡献,当然应该得到正视和研究。可惜这类书过去基本上被我们这些研究中日汉字新名词关系的研究者所忽略了。

我要谈的第四点是,在早期日本政府的有些对华公文中,有的也曾较早地使用过一些汉字新名词。笔者曾专门研究现代“文明”概念的标志性汉字符号,认定其最早产生于明治初期的日本,但总以为其传播到中国时间较晚。可最近阅读《筹办夷务始末》时,竟然发现,早在1870年,日本外交官在致总理衙门的《日本国信函》中,就曾将“文明”一词的现代用法传到中国来了。该函写道:“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大宪台下,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临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七)这种特殊现象,目前也还没有引起同行的注意。

三

我要谈的第五点是,一些日本早期汉学家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时期曾活跃于中国的一些重要报刊

上,这对日本汉字新名词的在华传播,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一点,目前在中日学界,也只有几个学者开始注意到并进行了初步探讨。

戊戌时期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莫过于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的《时务报》,其中传播日本新名词最为有力的,又莫过于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主持的“东文报译”栏。当时,在中国传播的日本新名词,90%以上都出现在类似的栏目里。《昌言报》有“东文译编”栏,主持人也是古城贞吉。《译书公会报》有“东文汇译”栏,主持人为另一日本汉学家安藤虎雄。《译书公会报》所引录和翻译的日本报刊就有《国民新报》、《太阳杂志》、《大阪朝日报》、《东京朝日报》、《国民报》、《经济杂志》、《中央新报》、《知新闻报》等10余种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罗振玉主编的《农学报》,其中的内容也主要译自日文,最初的重要译者有日人藤田丰八、古城贞吉等。1898年6月,日本人山根虎之助还直接在上海创办了中文《亚东时报》,主要内容也是来自日本报刊。1896年复刊于武汉的《汉报》,其主笔也曾为通汉语的日本人冈幸七郎。

当时,这些日本人不仅在著名的中文报刊上大量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有的还用中文翻译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也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不少日本汉字新名词,如1893年藤田丰八翻译出版的《蜜蜂饲养法》

一书,1898年古城贞吉翻译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等,就是例子。

戊戌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中国人也传播过一些日本新名词,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最为典型,但前者并非是直接使用日本新名词,而是间接传播;后者则由其女儿康同璧等帮助完成,且进呈后藏于宫中,影响有限。梁启超在戊戌时期使用的日本新名词也很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在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方面,以古城贞吉为代表的日本人发挥影响于无形,贡献最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梁等并没有满口新名词,而当时社会上日本新名词却大量流行开来的奇怪现象。关西大学教授沈国威先生曾对古城贞吉在《时务报》上传播日本新名词的活动有过初步的开拓性探讨,并列出一个其所传播的新名词表,但对其传播活动的实际影响却未加分析。(我曾在2002年3月的“16~19世纪近代新词·译词的形成与交流国际研讨会”上,见到过沈国威教授的《日语词汇进入汉语始自何时——以《时务报》的“东文报译”为个案的分析》一文。此会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和日本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朱京伟教授组织。至于日本人此期在中国传播新名词的整体情况,目前就更缺乏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讨论了。

总的说来,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新名词在华传播的影响还很有限,不论是日本人直接传入,还是经过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传播,影响都不能

夸大。以“宗教”一词为例,虽然日本人此前在中国有过多次传播,中国驻日外交官姚文栋在1884年翻译的《日本地理兵要》等书中也有准确而多次的现代意义的使用,但一直都没能引起中国人真正的重视。因此戊戌时期,严复曾一度将Religion译作“教宗”,梁启超等人也都跟从严译,直到戊戌以后,随着大量日本新名词的流入,“宗教”一词才在中国真正流行开来。

为什么在戊戌时期,日本汉学家会活跃在中国的报刊上,并在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方面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呢?其一,是因为中国人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认为日本学习西方成功,中国人应向日本取经;二是张之洞等当朝大僚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从日本学西学,可以事半功倍,节约时间;三是当时的中国完全缺乏日语人才,只好直接引进像古城贞吉这样的汉学家来帮忙救急。而日本汉学家毕竟不像严复等人那样在翻译日文过程中严格地遵循古文遣词造句的规矩,而报刊出版的短周期也容不得他们像严译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日本早已习惯了新汉字造词的含义和用法,难以改变。这就促成了他们在汉译日文的过程中,大量直接地照搬现成的日本汉字新词而无所顾忌了。事实上,由于上述原因,戊戌时期梁启超等人也无法控制“东文报译”栏里日本新名词的大量涌现,只好听之任之而无可如何。

这种由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直接大量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的历史现象 表明戊戌时期日本新名词在华传播也存在某种偶然性 ,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 ,它为梁启超后来流亡日本期间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大胆而大量地吸收日本新名词 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世纪初期 ,中国人特别是留日学生逐渐成为了传播日本新名词的绝对主力军。但即便如此 ,日本人直接向中国输出新名词的活动也仍然不能忽视 ,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各级学校任教的日本教习。他们通过编辑教科书等方式 ,在传播日本汉字新名词方面 继续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作用。如京师大学堂心理学教习服部宇之吉 ,在这方面就是一个相当自觉的突出人物。他不仅在课堂上大量传播日本新名词 ,在公开出版的讲义(如影响很广的《心理学讲义》)中亦然。1904年年底1905年年初 对于张之洞负责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不准乱用来自日本的那些不太“雅驯”之词明确规定 ,服部甚至还表示了公开的抗争。他写道:

奏定学堂章程纲要有不许用新语之不雅驯者一条 ,然学术欲随时而进步 ,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 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 ,中国不乏其例。春秋战国诸子暂舍而不论 ,即唐代玄奘等译佛典亦多用此法。盖传外国之学术宗教者 ,自己国语苟无适当之语 ,则不得已而为此也。玄奘等所创

作之语 ,在当时未必皆雅驯 ,而令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由是观之 ,语之雅驯与否 ,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今中国正当广求知识于外国之时 ,而敢问语之雅驯或因此致阻碍学术之发达 ,则岂能免颠倒本末轻重之讥乎?本书所用学语 ,专据日本学界常用之语。其中或有所谓不雅驯者 ,然在日本则既一通行 ,而在中国又无可代用 ,毋宁仍用之。非敢蔑明章也。

如果将服部的这段议论同几个月后王国维那篇著名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相对照 ,简直要怀疑王国维直接、间接就是受到他的某种影响了。不管怎么说 ,在清末 ,公开倡导输入日本汉字新名词 ,为此公然与朝廷大僚对抗的第一人 ,应不是通常所说的王国维 ,而属于这位日本客卿、著名教习服部宇之吉。

至于日本人创制的汉字新名词对于中国清末民初中国新名词术语建设的特殊意义 ,我曾在《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一文中有过专门研讨。在那篇文章中 ,我曾提出过所谓“断裂式滋补”和“增长式滋补”的概念来对此加以说明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 ,我的讨论还很粗略 ,只是以“札记”的形式提出这一有意义的问题 ,以促请同道一起研究而已。敬请不吝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